

《罗世文传》序言

陈 文

郭久麟同志撰写的《罗世文传》由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作者几次嘱我为此书写一篇序言。本来，这个任务由其他老同志承担更恰当一些，但考虑到几年来我一直负责四川地方党史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四川党史人物传的编写也是工作内容之一；一九三九年，我又曾在罗世文烈士领导下工作过，出于对烈士的崇敬和怀念，出于对党史人物传编写工作的热爱和关切，我只好不计笔拙了。

《罗世文传》忠实详尽地记叙了烈士的一生。从一九〇四年出生到一九四六年八月牺牲在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总共四十二年。这四十二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但它对中国人民来说却是水深火热、血雨腥风的四十二年，是自求解放、英勇战斗的四十二年，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四十二年。这四十二年，四川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描绘了一幅又一幅宏伟壮阔的历史画卷，涌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罗世文烈士就是这些英雄的一个代表。他既是这幅伟大历史画卷的画中人，也是伟大历史画卷的丹青涂抹者。幼年，他曾目睹辛亥革命中四川人民推翻清朝政府的英勇战斗。五四运动后新文化在四川的传播，他有切身感受。他参与并领导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为四川地方党创建作过重大贡献的老一辈革命家谭代英、肖楚文、王澍公、吴玉章等同志，都是罗世文的战友和知交。一九二五年下半年，他荣幸地由党派遣到列宁故乡、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党和人民处于危难关头的时候，他回到祖国，回到四川参与省委领导工作，以后担任书记职务。他参与领导了旷继勋部队的武装起义，打起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的旗帜。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建立起川陕革命根据地以后，他以四川省委书记的身分去到根据地，在张国焘排斥打击迫害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为根据地的发展流了汗，出了力。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他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派遣回川做川军刘湘、邓锡侯等工作，后来又担任川康特委书记，对四川抗战初期的抗日救亡运动，对四川地方党的重建给予了有力的指导。一九四〇年三月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以后，在集中营里继续坚持斗争，不为敌人的压迫利诱所屈服，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和高尚的革命精神。在经历了六年多牢狱生活以后，他给党留下了珍贵的遗信，在刑场上高吟革命的诗篇，壮烈牺牲！

传记根据中共党史，根据四川地方党史的发展线索，记载了革命历史发展如何哺育烈士成长；烈士又如何用自己的革命实践，用鲜血和生命推动历史前进。鲁迅诗云：“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借用它作为罗世文同志一生的总结，我认为还是比较恰当的。烈

战士们血沃中原、血沃四川，哺育了急风吹不折的遍地“劲草”；内外反动派掀起的寒流滚滚的大地上，都生发着即将烂漫开放的春花。当罗世文同志及其他烈士们血染中国大地之时，新中国的胎儿，已在受难的祖国母腹中躁动了。一九四六年八月，美蒋反动派在全国发动空前的大内战，罗世文牺牲了，千万个烈士牺牲了，而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了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伟大的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的东方屹立起来了！由此可以说，《罗世文传》既是烈士自身成长的内容丰富的历史，又是四川人民在党领导下英勇奋斗不惜牺牲夺取胜利的历史，又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全国人民在党领导下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夺取胜利的历史。因此，这本传记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战士的成长史去读它，可以作为四川地方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去读它，可以作为中国人民自求解放斗争历史的一个侧面去读它。我们从中可以找到革命者个人成长的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出地方党发展的经验教训，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从这个局部理解中国革命的一些重要经验教训，这样说，不能说是故意夸大吧？

作者用文学体裁写这本传记，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对历史人物的刻画，采用形象的手法，文学的语言，这对于读者来说无疑可以增加阅读的兴味，读后能在自己脑海中留下较深刻的印象，使传记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作者郭久麟同志现在年近四十，他在四川外语学院担任中文课教学的有限业余时间内，在完成了《随卫敬爱的周副主席》和《陈毅青少年时期的故事》之后，就集中精力写这本书。他到许多省市去考察烈士的生平，访问了罗世文同志生前有过往来的同志，查阅了有关的党史资料、档案。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完成初稿后，又经过三年时间再调查、再修改。他的稿子送给我看前后共有三遍。对于有关同志的意见他都认真对待，再调查，再核实，再修改，说明他对党史负责，对烈士负责，对读者负责。这种精神，这种学风，值得发扬。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本书也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从个人感觉到的来讲，写烈士青少年时代这一部分文字稍嫌长，而且有些地方略微给人欠真切的感觉，文彩也稍次。但是，从第二章写到罗世文参加革命以后，材料就更丰富了，人物更真切丰满了，文字也更形象、生动、鲜明了，自然文学味也更浓了。是否如此，请读者读后去评判。第二，罗世文同志一生，涉及四川地方党多方面的历史，传记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叙，人物的评价，不能说都百分之百的准确，虽然作者对此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疏漏欠准之处恐怕难以完全避免。这在四川地方党史编写正处在收集材料编出大事年表的阶段，要求作者个人做完有关党组织、党史工作者还要几年才能完成的重大任务，当然是不现实的。这方面如读者特别是一些老同志发现问题后，请向作者提出，允许作者在传记重版时再作补充修改。第三，罗世文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是我们，是后代都应崇敬的英雄人物；但他自己的一生也不是毫无缺点，毫无教训的。比如，三次“左”倾路线统治全党，曾使苏区党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党损失百分之百，这一段时间他正是四川地方党的负责人之一，错误路线难免要执行，四川地方党受到损失，也不能完全脱去关系。我们研究历史，要重视这一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但不宜过多地讲个人责任。传记根据这一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原则，粗而不细地表述了有关问题，我想是比较恰当的。还有，罗世文同志被捕发生在一九四〇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的时候，反动派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借机嫁祸于人，朱亚凡同志已被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川康特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特委领导人到乡下暂避一时，以防敌人突然袭击。罗世文出于对事业的责任心，并认为自己是身分已经公开的共产党员，在

敌人进攻面前不能示弱，仍然到《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去处理工作，而被敌人暗算，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这件事如何正确评价？显然，罗世文同志的主张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从另一角度考虑，如他对我们讲统一战线时曾正确总结王明路线在十年内战中的“左”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的经验教训，教导我们要开展两条路线斗争，而抢米事件后，他却疏于防范，是否也属考虑欠周全呢？烈士已英勇牺牲了，我们对已不应苛求了，但这个教训，后来者却应当认真吸取。

中国人民解放斗争胜利已经三十多年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党的十二大以后，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战斗已经打响，新的历史性的长征已经胜利开始。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不同于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未夺取政权以前的黑暗岁月，但前进道路也不会一帆风顺，毫无障碍。新的历史是旧的历史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历史经验仍然值得人们注意，历史人物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仍然有重大的借鉴作用。让我们在烈士们先辈们开创的宏伟业绩的基础上，认真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去开辟我们共产主义的更伟大的前程吧！

烈士们永垂不朽！

一九八三年二月廿一日于成都



“十九年”非一十九年

杨本祥

《庖丁解牛》中两言“十九年”，课本未注，一般读者都将其理解为实数一十九年，其实未必。

《庖丁解牛》是战国时广泛流传的一则寓言故事，不一定实有其事。因此，不必将“十九年”机械地解成一十九年。联系上下文“良庖岁更刀”、“族庖月更刀”、“所解数千牛”，其中的“岁”、“月”、“数千”皆虚数，“数千”以言其数量多，“岁”、“月”以言其时间短，故“十九年”亦是虚数言其时间长，应理解为“十、九年”即十年九年。汪人钟先生《庄子发微》于《养生主》曰：“十九年，十年九年也。《书》《无逸》之篇曰：‘或五六岁，或四五年’。此云十九，犹彼云四三矣。”另

外，《论语·述而》：“加（按，加即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清经学家俞樾在其所著的《续论语骈枝》里说：“‘五’、‘十’二字承‘加我数年’而言，盖不取必所假者几何年，故著二字，言五或十也。”这也可作为将“十九年”理解为“十、九年”即十年九年的又一旁证。

“十九年”与“十、九年”从意义上看，皆言其久，差别甚微。但从结构上看，一是以具体的数目字言其久，一是以并列的两个虚数合而言其久，其区别是很明显的。